

地方文史

地下宝藏无恙否?

——蒲城唐五陵被盗探津

郭昭明 马芳印

关中唐十八陵是否被盗?一千年来不仅为专家学者所关注,并为人们饭后茶余所乐道:或以为唯乾陵未盗;或加以桥陵未盗;或以为乾陵、庄陵未盗;或以为乾陵、庄陵、及蒲城四陵均未盗。本文着重对蒲城唐五陵考证后认为桥陵、景陵、光陵未盗;泰陵可能被盗;惠陵遭盗。

作者郭昭明,1955年生,陕西省历史学会会员、蒲城县五陵文物学会常务理事;马芳印1936年生,中国唐史学会会员、蒲城县五陵文物学会常务理事、县政协委员、县文化馆副馆长、文博馆员。

蒲城,在周秦汉唐一直为京师畿辅之地。唐玄宗时升为赤县(有唐一代,惟京都长安、万年、东都洛阳及发祥之地太原等县为赤县)。在蒲城北部蜿蜒起伏的崇山峻岭之间,自西向东分别分布着唐朝睿宗李旦桥陵、宪宗李纯景陵、穆宗李恒光陵、玄宗李隆基泰陵四座帝陵(全国共有20座唐帝陵),加上地处平川的让皇帝李宪号墓为陵,合称唐五陵。

五陵,是盛唐至中唐社会经济由盛转衰的见证和缩影。五陵地面建筑均毁,而至今尚存的石刻艺术群被称为唐代石雕露天博物馆。中国文物总局顾问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先生于1982年8月视察桥陵后说:“在我有生之年,能看到这样好的石刻艺术真是莫大荣幸!”

本文收稿日期:1989年11月28日

阁赋诗》(他的诗写得不错,现沈阳故宫保和殿楹联:“夜黑闲吟左思句,时晴快仿快军书”即是他的诗句。对仗奇妙,寓意深刻,为后人所称颂)等十余种数十余卷。另著《读易札记》、《读论语、孟子录》,自谓于退休之后,详见参订,不料未及刊印而

卒。其《葆淳阁集》手稿十二册二十九卷,现藏于韩城市博物馆。他晚年致力于经学研究,颇有成就。

致谢:在本文完成过程中,曾得到韩城市志办公室石启幸、程俊青、贾珉、同锁林等同志的帮助,笔者在此殊表谢意。

“这些石刻经过千年风雨，仍然栩栩如生，这在国内是罕见的。人常说‘桂林山水甲天下，’我看桥陵的石刻艺术，也算得甲天下了。”地面石刻尚且如此，那么，地下宫殿当亦如人间天堂，令狐楚《宪宗章武皇帝哀册文》谓：“江海之流于泉下，城郭取象人间。”既然如此豪华奢侈，能不使利令智昏者想入非非垂涎三尺？那么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是否遭到被盗和破坏？这个问题不论在过去和现在，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。

众所周知，唐帝陵是以封土为陵和因山为陵相结合，而以后者为主。封土为陵仅需一个风高月黑夜即可被盗；而对于依山为陵者要对寝宫进行破坏，一是人为盗墓，一是天然破坏。羨道（或称埏道，俗称墓道）是进入墓圻（即墓穴）的终南捷径。不打开羨门，不免望陵兴叹，徒唤奈何。至于天然破坏，惟有地震了（地下水的破坏，在渭北旱原尚未发现，当无可能）。蒲城唐五陵在一千一百多年中，受到70余次地震或重或微的影响。其中明成化二十三年（公元1487）、明正德十六年（公元1521）地震皆为破坏性地震。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夜（公元1556年1月23日）发生的震级为8级，裂度为11度的关中大震，震中在华山断裂带。蒲城距震中不足100公里，地面建筑破坏严重，但对唐陵内部破坏程度如何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。

此外，帝陵陪葬墓均为封土，许多至今不知所在。另李思训墓“文革”初期“破四旧”中被掘，王贤妃墓被盗并发掘后遭破坏；金仙公主墓被发掘；代国长公主墓近年数次被盗未遂，其中一盗眼已入墓室、盗眼周围彩绘壁画稍有破坏，因墓穴为淤泥而幸免；高力士墓据当地群众说被盗。陪葬墓在历史上多难免噩运。因此非陵为墓，本文不予涉及。

蒲城五陵中，惠陵被盗，史有明载：宝应元年建寅月“丙戌（公元762年2月4日）盗发敬陵、惠陵。”（《新唐书·代宗本纪》）我县有人将敬陵作景陵。如刘福谦、宋吉文《蒲城县志·大事记》油印稿第九页有“春正月，盗发（掘）景陵、惠陵（《本纪》）。”实误。其实，敬陵为唐玄宗开元末期宠妃武惠妃之陵。《旧唐书·贞顺皇后武氏传》：“惠妃以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，……葬于敬陵。”

那么，其余四陵命运如何呢？

我们知道，中国历代皇朝对本朝陵寝责无旁贷地要予以保护。长孙无忌的《唐律疏议》第二篇《卫禁》即规定不得私入宫廷陵寝。既然私入不得，那么起码在有唐一代不好盗发吧？因为各帝陵均有保护机构。唐玄宗于开元十七年十一月“丙申（公元729年12月4日）谒桥陵。上……以所管万三百户供陵寂，三府兵马宿卫（派军队保护）。”（《旧唐书·玄宗本纪·上》）

破坏帝陵属犯上作乱的十恶不赦之罪。而对保护帝陵不力的渎职者则给予严厉处分。如宣宗大中五年（公元851年）“十二月，盗斫景陵神门戟。京兆尹韦博罚俸两月，贬宗正卿李文举睦州刺史、（景）陵令吴阅岳州刺史、奉先令裴让随州刺史。”（《旧唐书·宣宗本纪》）

从秦始皇到辛亥革命前的两千一百年里，中国一直是封建社会。历代帝王在建立政权后，对历朝皇陵悉加保护，即令前朝帝陵概莫能外。如“中兴之主”的唐宪宗景陵右前方曾分三区竖有四、五十通碑石，被人们誉为“唐陵碑林”（民国初年尚完好，今已荡然无存）这些碑石，既是宋至清祭祀、修葺景陵的记录，亦是历代王朝保护前代帝陵的缩影。明朝曾下诏对全国35座历代帝陵为重点保护对象，景陵即其一座。

地方官吏亦须对历代皇陵加以保护。清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十一日（公元1756年11月3日）代理蒲城知县沈元辉竖立保护泰陵碑。乾隆四十年（公元1776年）前后，陕西巡抚毕沅下令修葺关中名胜。蒲城五陵亦加修葺，竖碑并修围墙各80丈围护。

总而言之，我们认为，倘欲盗陵（尤其盗山陵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：乱世和官盗。

那么，谁能危及唐陵呢？（为了论述方便，我们扩大至五陵以外的其他帝陵）。

（元）朱泚 朱泚本为唐臣，泾原兵变，唐德宗逃奔奉天。兴元元年元月（公元784年1月27日），唐德宗在奉天行宫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后下诏：“朱泚反易天常，盗窃名器，暴犯陵寝，所不忍言。”（《旧唐书·德宗本纪》）事实上，在朱泚自称“大秦皇帝”，更号汉，改元天皇以后，身边即有人纵容朱泚盗发唐陵。“或谓泚：‘陛下既受命而存唐九庙、诸陵不宜。’泚曰：‘朕尝北面事唐，胡忍此？’”（《新唐书·逆臣传·上·朱泚传》）其实，此非朱泚真言。首先他入据唐都长安，德宗仓惶“巡狩”，府库所藏，想必足够其暴殄天物，何需舍近求远，取诸帝陵？其次，人心思唐。为了拉拢人心，以图兵不血刃而“仁义取天下。”而诏书中所谓“暴侵陵寝”，当指“泚移帐于乾陵”，“斩乾陵柏，以夜继昼。”（司马光：《资治通鉴·唐纪四五》）之类褻渎行为。即令朱泚盗陵，也不过在奉天（今陕西省乾县），而非奉先（蒲城）。

（亨）农民起义军 广明元年（公元882），黄巢入潼关，唐僖宗“西狩。”其年夏，沙陀会诸军平京师。……，大乱之后，宫观焚残，园林皆发掘，鞠为丘莽。”（《新唐书·王徽传》）黄巢退出长安后，高骈上书唐僖宗也说：“今则陵园开毁，宗庙荆榛。”（《旧唐书·高骈传》）黄巢守长安，不思追歼唐僖宗，陶醉于胜利之中；梁田之役，一败涂地，即退出长安，仓促出关。梁田在何处？或以为在距桥陵不远的良村、田村西北，但史学界一致认为，梁田坡在渭南西与临潼接壤处。退一步讲，即令梁田坡在蒲城，大战在即，激烈拼搏，对付官军尚感吃力，战后即仓促出关的黄巢又有何暇毁陵？高骈远在江南，对关中战况并不十分了解，难免有道听途说危言耸听之嫌。因为连唐僖宗也不相信，令郑畋复诏斥其“指陈过当。”（《旧唐书·高骈传》）唐帝陵未被盗应该是可信的。至于陵园荒芜则在所难免。此后，宋金三大战役之一的富平战役距五陵虽不远，但属民族斗争，而且金意在于攻城掠地，也无暇去盗陵。元末，红巾军在北方亦很活跃，曾围攻蒲城县城。明末，李自成也曾多次途经蒲城，且在蒲城孝通镇暂师，但地方史料无破坏皇陵记录，传说亦未见盗陵流传。同样，西捻军首领张总愚（应为张宗禹）在桥陵脚下——兴市镇北驻扎数月，但据地方史料记载起义军秋毫无犯。既如此，必无盗陵之嫌（参见光绪版：《蒲城县志》）。

（利）梁永 《明史·宦官二·梁永传》：“万历二十七年（公元1599）二月，命往陕西征收名马货物税盐，故不典兵。永独畜马五百匹，招致亡命”，“巡行陕地，尽发历代陵寝，搜摸金玉，旁行劫掠。”似乎三秦帝陵无一幸免。那么，梁永是否盗陵？不能说没有。富平县文博同志说，富平唐五陵中宗李显定陵即为梁永所盗。而蒲城尚未见梁永盗陵史料。我们认为，梁永虽横行无法，但揭其奸者也不少，如陕西巡抚顾其志，大学士沈鲤、朱赓等，皆上疏弹劾，万历帝迫于舆论，乃召永还京。因此，梁永不可能在几年内遍劫三秦诸陵。

（贞）温韬 这种说法最为广泛。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六月丙戌（公元925年7月18日）下诏：“关内诸陵，顷因丧乱，例遭穿穴，多未掩修。其下宫、殿宇、法物等，各奉陵州

府，据所管陵园修制。仍四时各依旧制荐飧。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充陵户，以备洒扫。”

（《旧五代史·唐书·庄宗本纪·六》）罪魁祸首何人？在诏书中避而不谈。因为“庄宗待韬甚厚，赐姓名李绍冲。”对此，手下大臣多有怨言。“郭崇韬曰：‘此劫陵贼耳！罪不可赦’！”而庄宗却千方百计为其开脱。“庄宗曰：‘已有之矣，不可失信。’遂遣还镇。”

（《新五代史·温韬传》）《旧五代史·温韬传》记温韬降梁后，“为耀州节度使。唐诸陵在内者，悉发之，取所藏金宝。而昭陵最固。悉藏前世图书、钟（繇）王（羲之）纸墨笔迹。”因《旧五代史》曾佚，今传本系清乾隆时四库馆臣邵晋涵等从《永乐大典》等中辑得。此文后缺，因而不知原书是否涉及他陵。《新五代史·温韬传》记其“在镇七年，唐诸陵在其境内者，悉发掘之，取其所藏珍宝。……惟乾陵风雨不可发。”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·后梁纪二》中也说：“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（今陕西省泾阳县），暴掠诸县。唐帝诸陵，发之殆遍。”

应该说，历史上对温韬盗陵的记载是可信的。刘福谦同志因而得出：“我县唐陵的宫殿被焚，玄宫被掘，金银被盗，就是那时发生的。朱温、温韬实在是破坏文化艺术的千古罪人！”（《蒲城历史丛话》蒲城县县志馆1984年版）。我们认为不可这样简单地下结论。

首先，不可不对温韬是否辖有全部帝陵、其令行所止略加考订。据两种五代史温韬记载，此人年轻时聚众为盗，占有华原（陕西省耀县）。乾化元年（公元911）被岐王李茂贞募为“假子”，改名李彦韬，封为义胜军节度使、令辖耀、鼎二州。均王贞明元年（公元915）降后梁，改耀州为崇州，改鼎州为裕州，改义胜军为静胜军，并改名温昭图，官职不变。后唐同光元年（公元923）降后唐，大臣郭崇韬劾其盗陵。温韬拜倒于刘皇后石榴裙下，因而性命保全，官位无恙。唐明宗即位后将温韬流放德州（今山东省德州市），不久赐死。观其一生，号令所及始终囿于义胜军一隅。而义胜军不过耀鼎二州。耀州治华原（今陕西省耀县），鼎州治美原（今陕西省富平县美原乡），约当今陕西省耀县、三原县及泾阳县北部、富平县北部。那么温韬何以能盗昭陵？因为李茂贞占有乾州之礼泉、奉天。作为“假子”，去“义父”辖地又有何难？但毕竟不是自己老窝。而关中唐陵分布在今三原县有高祖献陵、敬宗庄陵、武宗端陵，在富平县有中宗定陵、代宗元陵、顺宗丰陵、文宗章陵、懿宗简陵，在泾阳县有德宗崇陵、宣宗贞陵，在礼泉县有太宗昭陵、肃宗建陵，乾县有高宗武则天乾陵、僖宗靖陵。已知乾陵幸免，其余十二陵不明。假设除乾陵外“发之殆遍”，至多也只有十二座！蒲城当时称奉先县，非温韬辖区，尔后为后梁所统，隶同州。温韬降梁后可能涉足蒲城。但是，后唐末帝李从珂曾下诏京兆、凤翔、耀州奉陵诸县修奉唐陵有阙漏者。

（见《全唐文》卷113）这告诉我们“阙漏”的唐陵在京兆、凤翔、耀州，对于同州却未涉及。而后唐首都洛阳距同州远比京兆等地要近！又，北宋建立后，太祖赵匡胤下令修复前代帝陵。开宝三年九月“甲辰（公元970年10月8日）诏西京、凤翔、雄、耀等州；周文、成、康三王；秦始皇；汉高、文、景、武、元、成、哀七帝；后魏孝文；西魏文帝；后周（引者注，即北周）太祖、唐高祖、太宗、中宗、肃宗、代宗、德、顺、文、武、宣、懿、僖、昭诸帝凡二十七陵尝被盗发者，有司备法服、常服各一袭，具棺槨重葬。所在长吏致奠。”

（《宋史·太祖本纪》）此二十七陵中有唐陵十三，但却无蒲城五陵。由此似乎可得出蒲城帝陵未盗的结论。既然正史未录，因而推出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信的（因为帝陵被盗在封建社会是重大事件）。1963年，陕西考古工作者试掘桥陵羡门，未发现盗痕，亦可作为佐证。

清赵吉人《寄园寄所记》谓“梁太祖开平二年冬十月，华原贼温韬，发唐泰陵。”材料似乎来源于《资治通鉴》，前文已经论及。清梁绍壬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谓：“有人掘唐明皇坟，出其髑髅一具，皆化为玉，急为掩之，见《太平广记》，其事甚怪。但小说载明皇假寐西内，李辅国欲弑之，以铁樵击其脑，不动。明皇曰：‘我自服叶法善丹药，骨节寸寸，皆化为玉，金石不能化也。’刺客大怖而退之。”看来，梁绍壬对宋人《太平广记》的真实性是持怀疑态度的。怪异之说，视为小说家言可也。

后梁乾化三年朔乙酉（公元911年4月2日），“岐王募华原贼帅温韬以为假子。以华原为耀州、美原为鼎州，置义胜军，以韬为节度使。使帅邠、岐兵寇长安。（梁太祖朱温）诏感化节度使康怀贞、忠武节度使牛存节以同化、河中兵讨之。己酉（26日），怀贞等奏击韬于车度，走之（原注：在长安北，同州界）。”（《资治通鉴·后梁纪三》）车度，即车渡，在今蒲城钤（qian）钊乡，距泰陵不过一舍之地。如果温韬盗发泰陵，估计当在败军之前。但从攻长安到车渡溃走总共只有25天，时间仓促，估计破坏程度不大。而且，随后土人掩埋，可能因此导致后来得出未盗的结论。而康怀贞、牛存节是否顺手牵羊、趁火打劫，尚难判定。至于由此至宋重修之日，是否被盗，更不敢信口雌黄。

已故的郭沫若先生《咏乾陵》中有句云：“待到幽宫重启日，还期翻案续新篇。”“地下宝藏无恙否？盛唐文物好探寻。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本文结论尚有“待到幽宫重启日”验证。

(上接第110页)

参考文献

(2) John Ciardi. *Away to the Poem* 《外语界》1986年第4期第27页。

(4) 刘海平《英美名诗选读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84年第1版第194页、第198页。